

周启超 主编

KUAWENHUA DE
WENXUELILUN
YANJIU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4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 著



南大学出版社
NAN UNIVERSITY PRESS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4辑)

周启超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4辑/周启超主编.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81091-989-0

I. ①跨… II. ①周… III. ①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文集
IV. ①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4232 号

责任编辑 贾怀廷

责任校对 田园

封面设计 马龙

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刷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90mm×960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420 千字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卷首语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而无所不包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而又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

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我们仍然有必要冷静地放眼世界。这并不是要迎合“全球化”大潮,与洋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世界上。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

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及“外国文艺理论学科”同仁就积极面对当代国外文论发育的多声部性与多形态性,积极面对当下国内文论发育的生态失衡——我们在国外文论的研究上往往驻足于思潮的“跟踪”、时尚的“接轨”,在国外文论的借鉴上时不时地就失之于“偏食”甚至“偏执”——这一理论生态失衡的现状,而以其对国外文学理论展开多语种检阅与跨文化研究的视界,以其多方位参照深度开采吸纳精华的宗旨,启动“比较诗学研究”及“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这两个项目。前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周启超主持,由刘象愚、史忠义、周启超、金惠敏承担;后者由周启超、郭宏安主持,由郭宏安、史忠义、董小英、周启超、吴晓都、程巍、任昕承担。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现代文学理论是在“跨文化”的状态中发育起来的,具有“跨文化”的品格;今日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自觉地具有“跨文化”的视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也是一种必要;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单一国别甚或单一区域的局限。在不同国别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理论比较,将有助于“理论诗学”的建构。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落脚点还是文学理论。

比较以跨文化视界来进行,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理论本身。

观照视野的开阔,是为了文论研究的深化。要恪守“文学/文论本位”。不能将这种比较泛化成“跨文学/跨文论的文化研究”。诚然,今日的文学/文论其内涵其界面已大大拓展,非昔日所能比,但核心命题并未消失。作家、作品、读者仍然是从“文学性”到“文学场”的种种文论研究难以回避的基本话题。比较要考虑“可比性”。分子水平上的“比较”,也许可以保障这种“可比性”。驻足于各种思潮的更迭和各种主义的较量,很难进入深层的、有可能以互证互识而达致“会通”的比较,很难进入彼此并无影响可言也谈不上什么平行但却有精神理念上契合会通的“类型学”比较。对于一个比较学者而言,最具有诱惑力和最具有价值的,也许正是这种比较,这种有可能去发现“隐于针锋栗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诗学“通律”的比较。自然,最具有诱惑力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比较并不是理由。比较诗学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目标。为比较而比较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比较诗学应当是一种路径。通过它,可以走向理论诗学的深化;理论诗学建设可以也必须在比较诗学中进行。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与互动机制,决定了理论诗学的建构可以也必须在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与会通之中展开。

所谓理论诗学,就是以比较开阔的文化视界,就文学发育本身的基本环节

上的理论展开理论性反思,以文学作品的结构肌理神韵、作家与读者的主体能量审美姿态创造机制接受方式、文学性与文学场的生成机理与互动形态这样一些诗学的核心命题上的理论积累,作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对各种范式的文论所关注的基本课题加以清理,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共通的“诗心”与“文心”。

这样的研究,既是面对“大文论”的冲击而守护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本体研究,又是针对“小文论”的封闭而开拓理论空间,而开放理论视野,探索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之局限的文学理论,探索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解释力的文学理论。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样的构想也许不过又是一种“乌托邦”。但我们以为,文学学园地的耕耘,还是需要“乌托邦”情怀,需要一批有所开放而又有所恪守,有所解构而又有所建构的“乌托邦主义者”。

周启超

目 录

6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	王杰 尹庆红(1)
渐入佳境:伊格尔顿理论中国之旅三十年	马海良(16)
解构论在新中国	胡继华(25)
现代性危机的文明史根源	史忠义(48)
“内外互动的文本”与文学作品的建构	
——尤里·洛特曼的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观	周启超(73)
从秘索思到逻各斯,到科学	
——思维模式的演变	董小英(99)
巴赫金的文论观及对形式文论的超越	吴晓都(123)
从“逍遥游”到“诗意地栖居”	任 昕(146)
文化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徐德林(167)
《青鞾》的时代	
——日本女性写作团体与女性意识近代化	庄 焰(195)
不同寻常的选择与实践	
——韩国现代作家廉想涉的文学与现实主义	金成玉(206)
“世界主义”的致幻剂:清末民初的“拼音文字”运动	
.....	程 巍(217)
当代“书写”理论中的犹太思想痕迹初探	王 涛(240)
凡人中的神仙	陈中梅(265)
回望诗章寻秘的足迹	白春仁(289)
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刘象愚(313)

文学理论:探索与追求视界的会通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健(342)

“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纪要…………… 汪洪章(349)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

王杰 尹庆红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回望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从 20 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特殊的时代语境中开始译介和传播,到 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演进以及 50 年代美学大讨论,80 年代美学热,90 年代以来的文论大发展,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已经获得了更完善的理论内容和更丰富的表达形式。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视野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性和关键地位日益突出,其理论影响和思想启发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60 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象化现实问题能力越来越突出,其理论范式展现出了可贵的实践性品格和批判性精神,在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中不断展现出广泛的影响力。在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正不断推向深入,从现实看,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不断进步,社会物质层面上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整体文化层次和素养不断提升,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和发展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机缘与现实条件,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内在的知识经验与学理发展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与压力,也存在着一些显著的问题,更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60 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拓展和思想影响,更有社会历史变迁下沉重的理论责任,知识经验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所导致的现实文化的分裂趋势,不同理论资源在相遇、影响、纠结中表现出的理论融通与对话的困难以及特殊文化时代的历史希冀导致的挑战与压力。从更为细致的角度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其理论发展的内部还缺乏系统化和学理化的机制,在这种情形下,从中国立场与中国语境出发,立足百年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着眼于 60 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范式转换的内在发展理路,深刻辨析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与表达方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以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代中国的学术定位以及历史责任,

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文艺大众化”与“中国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范式在中国的创构

在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种历史性的学术脉络。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这本身是一种历史的选择,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社会实践的产物,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特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历时性的发展演进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内容与形式不断地发展深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相比其他国度有特殊的线索。^① 总结和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成绩当然离不开这种特殊的理论的历时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并非完全由历史与现实变化所导致的必须要“外来传输”的产物,更有着理论与观念变革的内在发展动因,即理论观念与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主观创构因素。特别是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观念的确立,这种创构因素的意义更加明显。

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当代文化现实中的指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在当代审美领域的独特作用,正是由于其理论观念与思想意识的进步及充分的实践影响所展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从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诉求形式到真正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与美学观念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始具体地在对象化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深入中国文学实践的理论,也真正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成果。对这一过程的深入分析应该是我们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百年发展历程不可忽视的内容,在其中,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6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更加体现出了丰富的理论效应,特别是那种外在的社会变革的吁求以及融入理论观念内在发展之途,从而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独特的创构过程。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文化体制与思想氛围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开始被“引入”中国的,这注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参见王元骧:《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我国当代的演变》,《湖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季水河:《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新潮、先锋与激进的色彩。由于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势,这种新潮、先锋与激进并非完全体现在文艺观念与审美观念的趋前性上,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担当意识。20 世纪 20 年代,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人开始初步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思想,但在那时,中国知识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并未获得完整系统的认识,而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平面地直接地介入社会的理论。这我们可以从当时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容看出,当时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如:郑振铎翻译的高尔基著《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沈雁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著《俄国文学与革命》、郑超麟翻译的《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仲云翻译的托洛茨基著《论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一声翻译的列宁著《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节译)、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恽代英、萧楚女、蒋光慈、沈雁冰等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的介绍^①,从篇目上看,多是翻译介绍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文艺状况密切相关的非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内容上看,则是更多地直接呼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实际问题的。这正是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附性,也是它滞后的特殊性”^②。也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早期的理论萌发阶段更多地展现了社会时代诉求的外在性特征,并未生成完备的理论形态。在以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中,则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更多地局限在文艺界的思想论争之中^③,因此也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理解。

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发展而言,是否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以及体系性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检视我们是否能够深入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在 20 世纪的早期,它的“域外来源”的特征以及中国的独特现实仍然决定了它在中国的接受困境,而就中国现实而言,即使有“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以及“革命文学”的呼唤与抗争,即便是有“五卅惨案”这样重要的“劳工事件”发生,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经验的滞后性与工人阶级革命理论的天然缺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① 见李衍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与传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张宝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③ 倒是当时的胡适在《四论问题与主义》中较早地谈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意义,但胡适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胡适当时称之为“阶级竞争学说”),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太过强调“阶级的自赏心”,并认为这是“阶级仇视心”的来源和许多惨案的罪魁祸首。

接受仍然停留在“主义”的层面上。而就文艺的现实状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在“民主”和“科学”的视野中也显得单薄,更难以真正发挥独特的作用。^①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完整的理论形态与体系性的认识过程就显得更加重要,它成了中国是否真正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标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是否在中国真正确立的标志,这种理论范式的创构毫无疑问是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的。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标志性的理论成绩,这种标志性在于孕育并深刻地表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和美学形式。《讲话》的发表以及日后的理论影响实践影响表明,从它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现实发展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左联”时期的存在特征,而有了新的转折,具体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意义与功能表现出了一种从“形式→内容”到“内容→形式”的掉转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学与理论界的实践影响不再仅仅停留在“文学革命”的“形式表达”意义上,也不再是“文学革命”的“内涵书写”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与精神开始在思想内容与表达方式的整体中与中国当时的文学实践相结合,并最终“以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即有了从形式→内容→形式的超越变革)将中国文学普遍的知识经验融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理论创构。

从理论层面上看,在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与“大众”的问题并非是从《讲话》才开始提出的,从1928年鲁迅和郭沫若关于“普罗文学”的论争,到1930年瞿秋白、周扬等人提出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次年上海文艺界开展的关于“大众文学”的讨论,中国文学在现代化历程中始终寻求“文学”与“大众”知识话语的连接。但在当时,这种连接的努力都集中在语法、文风、文体等文学的表现形式上,即文学如何表现大众的语言。^②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大众化”则表达了全新的理论观念和思想观念,在“文艺”与“大众”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具有原创性与现实性的理论追求,因此,它在中国文学的“大众化”问题阐释上具有旗帜鲜明的理论拓展意义。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

① 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视野中更多强调的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更多地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左联”文学时期茅盾、蒋光慈等人的小说也更多地表现出从“文学革命”的“形式”到“革命文学”的“内容”的转换,这种变化仍然更多是在社会外因的促动下发生的,文艺观念与文学理念内部的变革还很微弱,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范式转换尚难发生。

②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相互结合起来……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①而为了这个目的,文艺要解决的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②,即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什么是“大众化”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③这展现出了毛泽东在理解文学“大众化”问题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一种角度和方式,即在根本上,“文艺大众化”是文学的体验的大众化,也就是革命的文学要做到“大众化”,首先要做的是“感情起了变化”。^④从中国40年代的文艺现实来看,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文学实践现实情形的判断以及“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理论说明,不仅仅是在文学的表达形式与文学的表现内容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是整体地表达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于中国文学经验的学理诉求,这也正是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地方。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经验更多地是在“文艺大众化”的道路上前进的。《讲话》之后解放区的许多文学作品如歌剧《白毛女》、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⑤等都展现了新的文学成绩。1942年底,陕西的秧歌团开始深入群众中间演出,则更加显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民族性特征。20世纪40年代,随着“文艺大众化”理论方针的确立以及文艺观念的深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始真正拥有了“中国化”的理论形式,这种理论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相呼应,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缔造深刻的理论武器和斗争武器,而来自底层经验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拥有了“人民性”甚至是“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47—8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1页。

⑤ 赵树理的作品在当时曾受到郭沫若、茅盾的赞扬,被誉为“文艺大众化”过程中的“赵树理方向”。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赵树理这类作家当时是“自觉地”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方向的。《讲话》以及“文艺大众化”在这些作家身上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其文学理念是如何受其影响发生重大变化的?这是目前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时忽略的一个理论盲点,即作家体验方面的变化。

民美学”^①的表达方式。因此,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大众化”不同于以往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它在新的理论高度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创构范式。这种理论创构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则衍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另一个重要的起源语境和特征:那就是更多地文艺界的思想观念论争与政党政治纲领性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孕育它的理论形态,文艺界的思想争辩和观念论争以及由此展开的艺术实践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经验,政党政治纲领性的主导意识形态则不但影响着文艺界的知识经验,而且影响了知识力量的分化组合^②,也决定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走向。也正是从那个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知识经验与理论创构开始孕育,它在中国文学经验中发展出了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和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精神高度,那就是“怎样将中国的民间文化模式、中国人的审美经验模式与结合起来,从而真实地表征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情感和审美经验这一相对困难的理论要求”^③。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创构的表征。

二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 关于基本问题与提问方式的考察

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开始,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开始在中国文学的知识经验中孕育并创构了“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更多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意义上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问题相呼应,但并不影响它在文学与美学理论层面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乃至至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体现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上。从理论的层面上而言,“文艺大众化”所确定的理论观念和理论形态直接构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① 如冯宪光则直接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人民美学”,参见冯宪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当时很多城市出身的作家开始投入到“文艺大众化”的创作中,并发生了生活方式与文学理念的重要变化,并相信毛泽东说的:“最干净的还是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③ 王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文艺研究》2008年第1期。

国知识经验相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就现实的层面而言,“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态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意识与现实精神,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选择与当代发展“是由现实的文学问题所决定的,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对象是当代中国的文学问题”^①。这两方面的因素表明,在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拥有它特殊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和研究对象,而对这种知识经验和基本问题的考察必须首先呼应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文学特殊的提问方式。

《讲话》发表之后的中国文学发展现实表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形式曾经在很长时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而来自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情感和愿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经验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问题实质就是理论建设与理论研究如何更切实地面对来自人民的情感体验与知识经验问题。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曾经表达了受压迫最深重的底层人们的情感和愿望,如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柳青、浩然等人的作品,它们不但成为“文艺大众化”理论的成功范例,而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象化现实审美经验的有力方式。历史证明,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文学大众化”的成功范例,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演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在文学史意义上凸显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而且影响了现实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格局。^②虽然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已经不再完全拥有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所确定的理论形态与表达方式,但从深层次的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仍然无法避免“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提问方式,仍然无法完全剔除“文艺大众化”问题内在的理论规约。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上的底层经验与大众文化仍然在不断发展,文学实践中仍然拥有“底层经验”^③与“大众化”的起源语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起源语境仍然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形态与基本问题有密切联系,它是中国当代审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以当代文学实践的特有方式展现出来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了

① 王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② 如抗战文学的理论形式其实与现实社会中的抗战方式有某种同构性,都是强调突出社会底层民众的经验与力量。

③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有底层叙事的文学,如蒋光慈、柔石的小说,在当时,这种文学叙事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上,更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产生深刻的理论联系。中国当下文学实践中的“底层叙事”却有不同的叙事形态和现实意义,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在这方面作出呼应。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与研究对象。就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这个主要问题与研究对象拥有现代性的蕴含,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如果不能把握当代社会大众的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这一基本问题,它将失去其现代性精神。

就此而言,从理论层面上回答“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面向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立场的一种必备的工作,同时也是直接呼应当代社会大众生活经验与情感诉求这一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已经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其中背负的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挑战也内在地包含在它的基本问题之中。经过了这一个世纪的上下求索,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在经历了现代性的矛盾与困惑之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仍然需要在根本上呼应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现实,并需要将之转化成内在的理论重建的内涵,从而更加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象化现实的能力,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首先应该把握的就是构成它的基本问题的语境特征。这个语境特征是什么?有的研究者认为是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与历史现实。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在当下,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现实快速进入了一个极度感性化、肉身化和平面化的历史时段,甚至像波德里亚所说的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①。消费文化的崛起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研究应该重视消费与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化因素。有的研究者则强调“后语境”^②的出现以及“后学思潮”的产生所造成的价值断裂和思想解构,认为当代理论研究 with 理论建设应该剔除那种体系性本质性的建构方式,走向相对主义个案主义的文学研究和理论研究。我们认为,这些观念不符合当前的文学现实与实际,更不应该是当前文学理论与美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当前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面临的最核心的语境特征。这种语境特征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现实与社会主义文学实践。^③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应该重视这一语境特征,在这

①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② “‘后’语境”是一种较宽泛的说法,它一般指的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思潮所产生的语境特征,也被称为“后学”(post-ism)研究。

③ 见王杰:《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学生产方式》,《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段吉方:《社会主义文学生产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样一个语境特征的把握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迫切需要更深刻地呼应中国当下“文艺大众化”的最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学与理论的知识经验中孕育了“中国化”的理论形态,也必将在中国文学实践中完成理论范式的重要转变。

三 60 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①转换

如果说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理论形态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完成了理论范式的创构的话,那么在这以后的 60 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真正实现了理论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作为一种“主义”、“学说”、“思想指南”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中国早期的文学家、理论家与政治家们更多地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吁求,在翻译、引进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念”与中国实际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相联系,更多地在“文学革命”的“形式”意义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那么经过了 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创构,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60 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早已摆脱了“形式化建构”以及“内容书写”的初期特征,开始显出实际有效的理论影响,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发生理论范式转换的重要过程。

60 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的转换同样是一个复杂、矛盾与充满各种思想交锋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它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历程更加艰难。因为理论范式的转换不仅仅意味着理论学说在选择与接收的单向传播和纵向发展,更意味着文学理念、思维形式、研究方法、话语体系、表达方式等多方面的综合变革,它充满了希冀、欣喜与理论收获的喜悦,同时也是一个孕育“危机”、提出问题、面临挑战同时又在“危机”与挑战中发生重要的理论转型的过程,“克服危机的过程与解决和回答现存的问题是同步的”^②。就具体过程而言,作为一种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又是与理论和

① “范式”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概念。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个时期内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答标准的整体标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每一个新范式的出现,都可能会导致重大科学成就的基本问题的变化。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② 李衍柱:《范式革命与文艺学转型》,《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2 期。